

# 共和国家理想与《新青年》的启蒙

张连义

**摘要：**共和国家理想是《新青年》启蒙思想的基础。国家与国民的密切关系使《新青年》同人意识到要建立理想的共和国家，必须根除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国民素质一方面要求国民身体强健，另一方面则需要重塑国民精神，而国民精神的重塑又是核心。早婚是影响国民身体的最大障碍，家族制度和儒家思想则是其根源，因此，否定儒家思想也就成为必然。在否定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全面学习西方国家，以民主和科学思想替代专制和封建思想就成为重塑国民精神的途径，也是启蒙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新青年》；共和国家理想；启蒙；文学革命

**作者简介：**张连义，男，副教授，博士。（浙江传媒学院 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0) 05-0098-06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确立了共和国家的政体，但处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共和政体只具有理论意义，因此，追求共和国家的内容，寻求内容与形式的合一就成为当时人们的主要诉求。《新青年》以引领青年为己任，强烈的启蒙意识是其明显特征，其启蒙涉及妇女、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目的是改造国民灵魂，提高国民素质，最终实现建立共和国家的理想，中华民国也由此成为《新青年》“启蒙”的基础。

—

在《新青年》第2卷第1号答汪叔潜的通信中，陈独秀提出了关于国家的设想：“近世国家，无不建筑于多数国民总意之上，各党策略，非其比也。盖国家组织，著其文于宪法，乃国民总意之表征。”又说：“宪政实施，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否则，虽由优秀政党掌握政权，号称政党政治则可，号称立宪政治则犹未可。以其与多数国民无交涉也。”在陈独秀的理想中，国家“乃国民总意之表征”，是全体国民意志的表现，潜台词则是，国家国政要公开，人民的自由要得到尊重。如果说如此论述还稍嫌笼统的话，那么陈独秀在《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中的表述可谓目标明确：“记者信仰共和政体之人也，见人有鼓吹君政时代不合共和之旧思想，若康有为、辜鸿铭等，尝辞而辟之，虑其谬论流行于社会，使我呱呱坠地之共和，根本摇动也。”<sup>[1]</sup>不难看出，陈独秀要维护的是刚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国——中华民国，表达的是对共和国家的向往。不过，因为当时的局势，所谓的共和国家徒有其名，政权实际上仍然是统治者的专政，人民的自由更是得不到保证。这对于有着共和国家理想的知识分子来说是绝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共和国家的追求。陈独秀关于国家的理想基本上代表了《新青年》杂志的态度，这不仅因为陈独秀作为《新青年》主撰具有象征意义，《新青年》后来逐渐变为同人刊物<sup>①</sup>，还在于《新青年》的作者也表达了类似观点。高一涵认为：“共和国的总统是公仆，不是‘民之父母’；共和国的人民，是要当作主人待遇，不能当作‘儿

① 《新青年》从第4卷第1号起，由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轮流编辑，不久鲁迅也加入编辑队伍当中；第4卷第3号刊登《本志编辑部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即《新青年》自4卷1号后改为同人编辑，不接受来稿；第7卷第1号更是发表本志宣言：“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共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

子’待遇，不能当作‘奴隶’待遇的。”<sup>[2]</sup>《新青年》特别强调共和国家与国民尤其青年之间的紧密联系：一方面，国家是人们的依托，“近世乃知人民之权力自由，由法律所赋予。国家权力强固一分，即人民权力强固一分，确认国家无自身之目的，惟以人类之目的为目的”<sup>[3]</sup>；另一方面，国民素质尤其是青年素质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前途，青年应该自觉承担起“立国”的重任，“可知立国精神，端在人民心理。人人本其独立自由之良心，以证公同，以造舆论。公同舆论之所归，即是真正国体之基础……故国体之变更与否，由吾人精神以观，几无研究之价值。吾辈青年责任，在发扬立国之精神，固当急起直追，毋以政治变迁，而顿生挫折，令吾人最贵之精神，转役于曲折循环之时势，而为其奴隶焉，则庶几矣”<sup>[4]</sup>。

从《新青年》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其关于国家的理想是名实相符的共和国，不仅要有共和国的形式，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在他们的理想中，国家的未来应该是国民的自觉选择，国民素质直接决定国家前途。国民素质不能靠国家的强行灌输或硬性规定，而是要由国民自己养成，“……道德不能由国家干涉的；不是说共和国家不必尚道德的，是说主人的道德，须由主人自己培养，不能听人指挥，养成奴性道德的”<sup>[2]</sup>。《新青年》关于理想国家的表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代表了当时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观念的基本认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理想色彩。其实，早在1903年，梁启超就在《新民说》中提出自己关于国家的理解：“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sup>[5]</sup>至中华民国建立，梁启超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已有部分实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共和国只是一个形式，缺乏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并且就是这样一个形式也不断遭遇冲击和质疑。处于这样一种关头，《新青年》关于理想国家的提出及设想就有了现实的针对性和时代的必然性。

## 二

中华民国的建立废除了存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但并未真正成为理想的共和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共和国有名无实，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共和国家徒有形式，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反而因为战争更加困难。对于这一点，当时的知识分子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中国由君主改为共和已经七年了。这七年里头纷纭扰攘，变故迭生，四万万人没有过一天安静的日子……中国一般的人民在这七年里头已经闹得个民不聊生，在战事区域内的，更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每天的生活，一天难似一天，租税加重，物价加贵，收入日少，钞票日跌。”<sup>[6]</sup>陶履恭认为当时的共和国徒有其名，其实质还是专制。“……所以人人的脑筋里是专制的。他的理想的政治是拿破仑、袁世凯，最服膺的政治观念是统一是武力。最赞美的道德观念是忠孝节义。上焉者每天的钻营谋干，不过是光宗耀祖，挂着一个爱国爱民的假面具。这种人民，因为久伏于专制制度之下，是专能骄下谄上，没有独立性的。”<sup>[6]</sup>这基本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共和国家一方面延续的仍然是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共和国家形式与实际内容的严重背离，自然引起不少人的质疑，甚至有人怀疑共和国国体是否适合当时的中国，于是，共和国的虚名不断受到冲击，随时有被变更的危险。杨度诸人发起筹安会，讨论国体问题，就引起很多人的兴趣。“此邦官民，对于吾国国体变更，莫不欣欣然有喜色。”<sup>[7]</sup>在此情形下，维护共和国的国体并探讨实行与之相适应的内容就成为时代的必然，也是《新青年》启蒙的主要内容。

既然国家是由国民组成，国民素质决定了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因此，从分析国民现状入手探讨理想国家的出路就成为必然。当时的国民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当时的情况是“吾国社会迄于今日兹，已陷入麻木不仁之象”<sup>[8]</sup>。顾克刚更是认定“盖今日所存之形式，谓之已亡，亦不谓过。所存一线之生机，惟在后进之青年耳”<sup>[9]</sup>。被寄予厚望的青年中的精英——学生如何呢？“环吾左右而居者，无一非堕落之人也。”<sup>[10]</sup>王统照在学校阅览处看到的是：“报章杂

志之陈列所，恐亦惟愿浏览一二狐禅之笔记，与夫妄诞不经之稗史，或则涉猎数页煨烬琐屑之杂著，以及文采风流之小说，而于类于进德修业之危言正论，与新颖精湛之科学的文字，乃绝不一观焉。”而记者认为：“惟国中大多数人，缺乏进步向上之心，此问题甚大。似非报纸可医，且恐非教育可救也。”<sup>[8]</sup>另外，在《新青年》通信栏以及诸多文章中，关于社会现状和国民精神状态的描述比比皆是，其总的特征就是麻木、消沉、了无生气。面对国民的麻木不仁和岌岌可危的形势，先进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sup>[11]</sup>这也难怪他们的思想如此激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更使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落后不但要挨打，还可能要亡国。在中西强烈对比中，他们开始审视自身并追究落后的根源，专制制度及其基础家族制度成为主要因素。“欧洲脱离宗法社会已久，而吾国终颠顿于宗法社会之中而不前进。推其原故，实家族制度为之梗也。”“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依据。”<sup>[12]</sup>西方国家的强势和专制造就的国家落后，使他们认识到，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必须从两方面着手。

一方面，要彻底推翻封建专制，扫除封建思想。首要的便是与复古主义、“保存国粹”的思想作斗争，这也得到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可。王禽雪就认为：“质言之，保存国粹，即保存故纸堆中之物耳。四顾国中青年，大多数之嗜好皆奴隶之嗜好，此所以来邻国之侮而莫敢抵抗也。故吾谓摆脱青年之奴隶性，实为切要之举……贵志，青年教育之尊师也，倘广发婆心，著论及之，俾吾辈青年得以摆脱奴隶性，而知独立自尊之光荣，非惟救青年，乃救中国耳。”<sup>[13]</sup>陈独秀的回复看似客观，其实基本上认同了王的观点：“国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乃国人于一切事物，无论好歹，凡是古代遗留者，均以‘保存国粹’为前提，不许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议，其弊将不可胜言。”<sup>[13]</sup>在与封建遗老遗少斗争的同时，更要彻底破坏其生长的土壤——封建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以扫清民主道路的障碍。“现在革除那固有的制度的坏的，实践民治主义，就是解救我们人民的根本条件了。”<sup>[6]</sup>在他们看来，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及其思想是封建思想的主要根源，其在当时的表现就是复古主义和“保存国粹”，扫除封建思想从而推翻封建专制，就要与复古主义和“保存国粹”的思想作斗争。只有根除封建思想和封建专制，才能实现民主，解救民众。

另一方面，要向代表了当时世界发展方向的西方国家学习。“我的思想，认定中华民国的一切政治、教育、文艺、科学，都该完全学人家的好样子，断不可回顾七年前的‘死帝国’”；“总期，中华民国的国民，做一个二十世纪时代的文明人，不做那清朝、唐朝、汉朝、周朝、五帝三皇、无怀葛天时代的野蛮人”<sup>[14]</sup>。如果说推翻封建专制和革除封建思想是破，从各个方面学习西方国家则是立。这种“立”不是形式上的一个共和国家的虚名，而是对西方的全面学习，是在否定封建思想基础上的全新国民。那一代人立场如此鲜明，态度如此决绝，容不得中庸和渐进，即使到了1935年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郑振铎依然在否定折中派，他认为曾毅、方宗岳、余元睿等都是“改良派”，“‘恐矫枉过正，反贻人之唾弃，急进反缓，不如姑缓其行’的人物，这些折中派的言论，实最足以阻碍文学革命运动的发展”<sup>[15]</sup>。

可见，建立理想共和国家的方法是与封建专制决裂，走西方的科学民主的道路，这一重任单靠少数几个人是做不成的，必须靠国民的共同努力。由是，提高国民素质就成为建立理想国家任务的重中之重。

### 三

《新青年》认为理想国家要表达国民总意，而国民素质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强弱，因此，国家富强必须依赖国民素质的提高。为此，《新青年》同人急切且不无激进地提出了废除汉字、提倡世界语，否定儒教和古代文化等一系列主张。处于当时的情势，极端也许更是一种姿态，以此表达对时局和现状的焦虑。受进化论影响，五四时代的学者对青年寄予全部的希望，老年人成为落后和守旧的象征。“青年



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充塞细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sup>[16]</sup>邓萃英认为，“老先生之罪，不在‘不通’，不在‘自诩’，实在戕害青年，犯精神的杀人罪”，“我们的目的，不在‘与彼为难’，不在‘攻其不通’，实在‘救济青年’，并‘表扬文学’”<sup>[17]</sup>。青年由是成为启蒙的重点。《新青年》批判国民惰性，探究其根源，力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又以西方为参照，有针对性地对国民进行全方位的启蒙和改造。当时，在《新青年》同人看来，国民落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体素质差，二是缺乏国民精神。于是，启蒙也就从这两个方面进行。

身体素质直接影响到国民性格和国民精神，提高身体素质成为《新青年》启蒙的重要一环。“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体育之自觉不可。”<sup>[18]</sup>体育锻炼的成效直接决定民族的体质，同时与心理素质也密切相关。对身体体质的重视和“力”的推崇成为改变国民素质的途径之一，一战中德国军国主义的最初胜利更是助长了这种风气。对大力士霍元甲的介绍，对西方军国主义的推崇都显示出《新青年》的这种倾向。程师葛认为：“中西国民强弱不同之故虽多，而中人爱和平，西人尚武勇，实足为其总因。故窃为德之军国主义，最适于今日之中国。”<sup>[19]</sup>同时，《新青年》还注意对疾病预防、卫生等的介绍，显示出对国民体质的重视。早婚是造成国民体质羸弱的原因之一，要提高国民素质，必须杜绝早婚，甚至禁止体弱者结婚。“以吾国今日经济状态，宜盛行独身主义，因产业加强效率低于人口增加之率也。以脑力体力衰，蔽言之，宜励行择种留良之法，禁止恶劣分子之结婚。岂独早婚之应戒已哉。”<sup>[20]</sup>追究早婚的根源，他们认为在于封建家族制度，而封建家族制度的根源在封建专制，在儒教伦理。毕云程就说：“仆以为欲禁止早婚，非打破根深蒂固之家族制度不可。”<sup>[21]</sup>陈独秀也说：“惟早婚主义，源于嗣宗主义，即家族主义，家族嗣续主义，源于儒教孔道祀祖孝亲主义，儒教孔道不大破坏，中国一切政治，道德，伦理，社会风俗，学术，思想，均无有救治之法，不独早婚一害已也。”<sup>[21]</sup>也正因为儒教伦理危害如此之大，所以才有了《新青年》对儒教伦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讨伐，甚至极端到要否定古代的文化。

提高国民素质首要的是改造其灵魂，提高国民素质，精神比肉体更为重要，鲁迅弃医从文的思想转变对此做了很好的注解。鲁迅开始学医也是抱着健身强国的目的，后来看幻灯片看到麻木的杀头的看客深受震动而弃医从文。“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sup>[22]</sup>对国民精神的改造必须靠先觉者的教育，对国民尤其青年进行教育成为《新青年》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当时思想和文化传播的媒介是用古文灌输旧思想，对国民启蒙也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从内容上来说，阻碍教育的原因是“文蔽”，因此必须提倡写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以改造之。“士之浮华无学，正文弊之结果。浮词夸语，重为世害，以精深伟大之文学救之，不若以朴实无华之文学救之也。即以文学自身而论，世界潮流，堕入剽窃浮词之末路，非趋重写实无以救之。写实派文学美术，自有其精深伟大处，恐犹非空想派之精深伟大所可比拟。”<sup>[19]</sup>当时通用的是古文，对国民进行教育要用新思想，古文已经不能表达变化了的新思想，因此启蒙的另一面就是从形式上提倡通用之语言，并进而提倡白话文，甚至世界语，对语言与文字进行改革。

《新青年》对青年进行教育的两个方面也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内容。进行文学革命必定涉及政治与伦理的革命，因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欲谋改革，乃畏阻

力而迁就之，此东方人之思想，此改革数十年而毫无进步之最大原因也”<sup>[23]</sup>。这里，共和国家理想经由“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民启蒙”的途径而最终表现为文学革命的形式。文学革命的范围要大得多，不仅是形式上的革命，还是推翻封建礼教和腐朽思想包括政治的、伦理的、心理的等等工具。在这里，文学革命又与古代文化发生紧密联系。在对封建政治、思想、伦理等的否定上，身体素质提高与国民思想提升殊途同归并有机融合在一起。文学革命的最初目的在于改造国民精神，最终目的则是提高国民素质进而建立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对封建腐朽思想的否定意味着民主思想的提倡。《新青年》的启蒙也正是通过对民主和科学的提倡否定专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新青年》的启蒙，或者说对国民尤其青年的教育主要着眼于此。启蒙要讲究方式方法，并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新青年》的另一旗帜——科学。“吾人今日之教育，既为科学进步之结果，则于公私生活各方面，须有相当之权利。”<sup>[24]</sup>《新青年》不但提倡民主而且提倡科学，也正在于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sup>[25]</sup>通过陈独秀的答辩不难看出，民主和科学当时已为国民普遍接受——尽管对其含义可能还存有误解，但作为概念，民主与科学已经深入人心。同时，也不难看出，《新青年》提出民主和科学的根本目的乃在于建设民主共和国家。

#### 四

共和国家的理想显然是政治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新青年》又一再表明不谈政治，二者在这里产生抵牾。我们不禁发问：《新青年》真的不谈政治吗？

尽管《新青年》一再表明，其主旨是“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联系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新青年》的表述，不难判断，这只是一个障眼法。《新青年》不惟批评时政，而且将政治看得很重。陈独秀在答复顾克刚通信中坦陈：“本志主旨，故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言，无一语拦人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青年也。”<sup>[25]</sup>顾克刚则肯定了陈独秀改造青年的积极作用：“素闻先生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惟冀国民思想根本之觉悟，则先生之负任，远在黎、段之上。黎、段之用心，惟在挽形式之不亡；先生之用心，当在挽精神之不衰焉。”<sup>[9]</sup>从顾克刚恳切言辞中可以窥探《新青年》对政治的关注和热衷。另外，从《新青年》编辑来看，陈独秀曾经有参加反清宣传活动和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创办《安徽俗话报》、协助章士钊主编《国民日报》《甲寅》杂志等经历，后来《新青年》更是成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可见，陈独秀始终对政治保持着高昂的激情。另外，具有鲜明政治倾向的鲁迅等人，以及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恽代英等人的加盟，使《新青年》的政治性更为明显。之所以一再表明不谈政治，也许《新青年》读者的通信可做最好的解释：“诚恐大志恶夫政象之不良，著论力辟，遭厄于大力者，强令停刊，则吾辈青年之粮饷，或将再断矣。”<sup>[26]</sup>由此观之，《新青年》所谓不谈政治只是迫于当时检查制度以及社会局势不得已的策略，这也使其与政治始终保持着一一种微妙的关系。

《新青年》的目的是“挽精神之不衰”，即从思想上进行启蒙，相对赤裸裸的政治革命要隐蔽得多，也较容易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既申明不谈政治又不回避甚至特别强调政治的作用，显示出《新青

年》对政治的巧妙处理，即《新青年》是在启蒙即思想领域内探讨政治问题，是将其作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从而淡化了政治这根敏感的神经，也是躲避检查的一种手段。应该说，《新青年》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处于当时的社会形势，理想共和国家观念的真正达成必须经由对国民的启蒙，其内容包括思想、伦理、体质、心理、道德等诸多方面，讨论的问题涉及人生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如妇女问题、早婚问题、文学革命、教育问题等等。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根源上寻找原因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对儒教伦理的批判和专制制度的否定也就成为最终的目标。《新青年》也确实是在这些方面做着努力，并始终保持着探讨中国解放的路径，从伦理觉悟为“最后觉悟”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组织群众，进行革命政治斗争，推翻旧制度，以取得“经济问题”的“根本解决”，并进而解决一切问题，“再不是‘伦理的觉悟’而是阶级斗争的觉悟成了首要和‘最后的觉悟’了”<sup>[27]</sup>。也正由此，《新青年》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逐渐演变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由国民启蒙的良师益友逐渐衍变为与反动统治斗争的工具。

参考文献：

[1] 陈独秀．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 [J]．新青年，1919，6（2）．  
[2] 高一涵．非“君师主义” [J]．新青年，1918，5（6）．  
[3] 高一涵．近世三大政治思想之变迁 [J]．新青年，1917，4（1）．  
[4]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 [J]．新青年，1915，1（2）．  
[5]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 [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7．  
[6] 陶履恭．我们政治的生命 [J]．新青年，1918，5（6）．  
[7] 王庸工．通信 [J]．新青年，1915，1（1）．  
[8] 通信 [J]．新青年，1916，2（4）．  
[9] 通信 [J]．新青年，1917，3（5）．  
[10] 通信 [J]．新青年，1917，3（1）．  
[11] 唐俟．随感录 [J]．新青年，1918，5（5）．  
[12] 吴虞．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工具论 [J]．新青年，1917，2（6）．  
[13] 王禽雪，陈独秀．摆脱奴隶性 [J]．新青年，1919，6（1）．  
[14] 通信 [J]．新青年，1918，5（1）．  
[15] 刘运峰．1917—1927 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34．  
[16] 陈独秀．敬告青年 [J]．新青年，1915，1（1）．  
[17] 邓萃英．文学革新与青年救济 [J]．新青年，1918，5（1）．  
[18] 二十八画生．体育之研究 [J]．新青年，1917，3（2）．  
[19] 程师葛．通信 [J]．新青年，1916，2（1）．  
[20] 陈独秀．通信 [J]．新青年，1916，2（3）．  
[21] 通信 [J]．新青年，1917，2（5）．  
[22] 鲁迅．呐喊自序 [A]．鲁迅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271．  
[23] 通信 [J]．新青年，1918，5（4）．  
[24] 马君武．赫克尔一元哲学 [J]．新青年，1916，2（3）．  
[25]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 [J]．新青年，1919，6（1）．  
[26] 通信 [J]．新青年，1916，2（1）．  
[27]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2．

[责任编辑：赵晓兰]